



中
國

叶牧师一家在

Pastor Ye's Family in China

团结出版社

叶牧师一家在中国
Pastor Ye' s Family in China

(美) 叶马利亚 著
By Kari Torjesen Malcolm

赵斌 译
毕邦彦 审校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叶牧师一家在中国 / (美) 叶马利亚著; 赵斌译; 毕邦彦 审校;
责任编辑 郭 强; 封面设计车行. —北京: 团结出版社, 1994. 7

ISBN 7-80061-594-4

I. 叶... II. ①叶... ②斌... III. ①叶永青—传记 ②叶水
青—生平事迹 IV. K837.1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04446 号

团结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京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94 年 6 月 (大 32 开) 第一版 1998 年 4 月第二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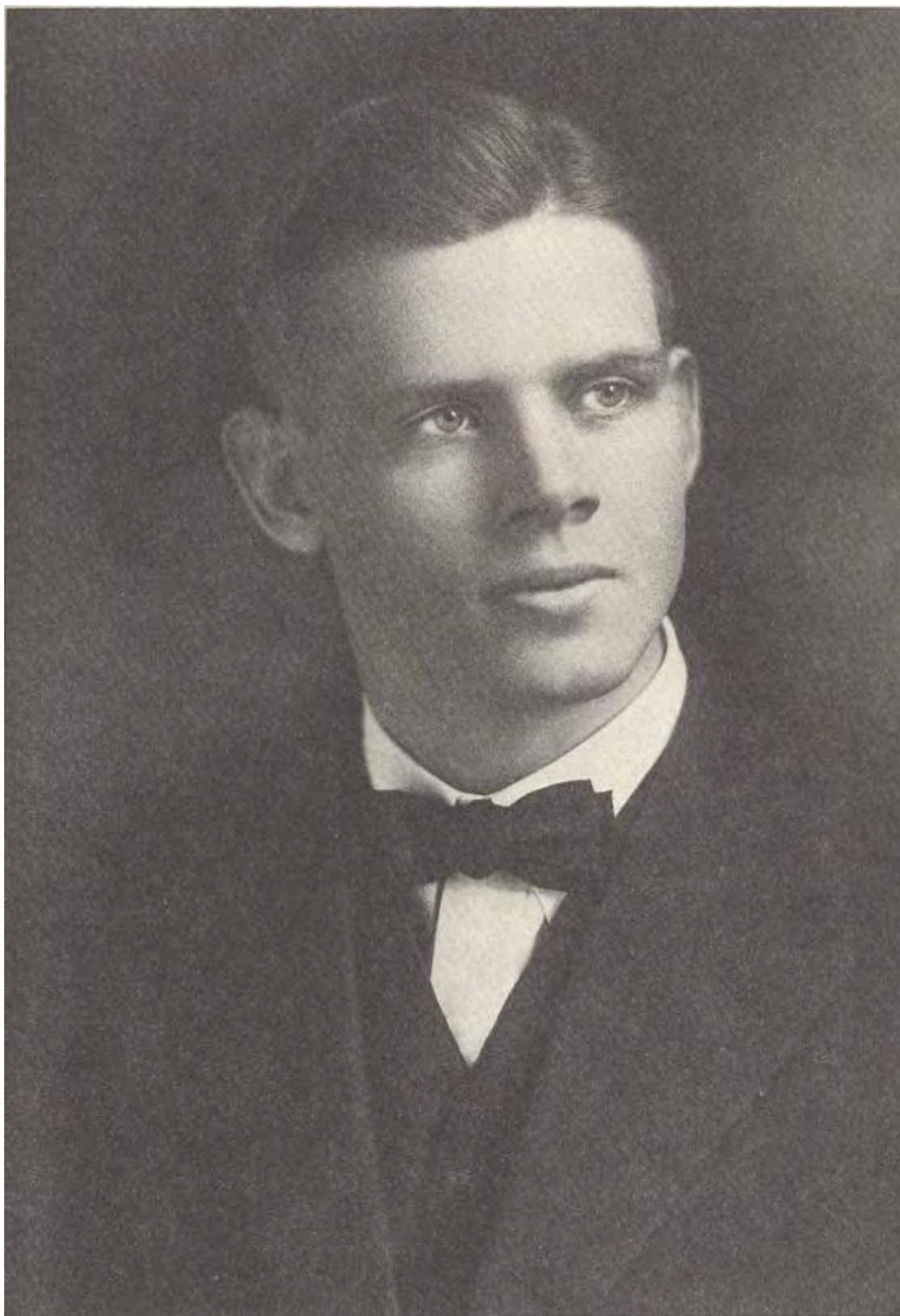
字数: 20 千字 印张: 1.375 插页: 8

印数: 2000-1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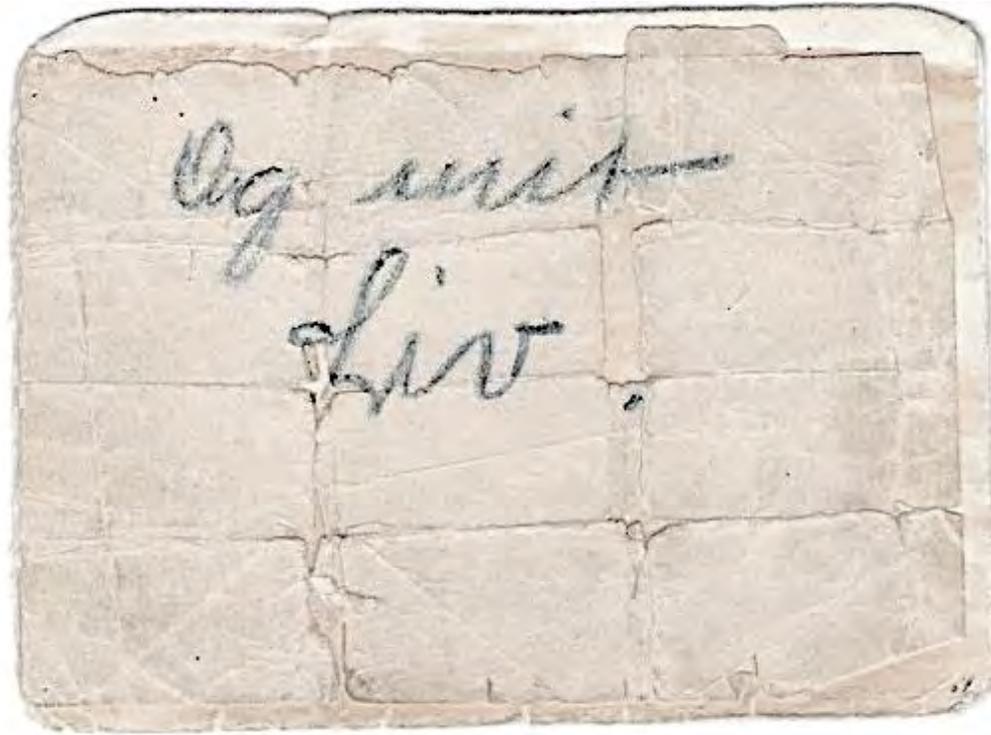
ISBN7-80061-594-4 / K · 71

定价: 10.50 (平)





叶永青于 1918 年来华前。



叶永青 1910 年放在募捐篮子里的一张纸条子：“还有我自己”。



1923年1月17日叶永青与端正方在山西岚县举行婚礼。



叶夫人在山西河曲家中学汉语。



保罗（1924年生于河曲）和她的中国伙伴孙贵虎在河曲。



保罗和马利亚（本书作者，生于1925年）
坐在家窝里，妈妈牵着缰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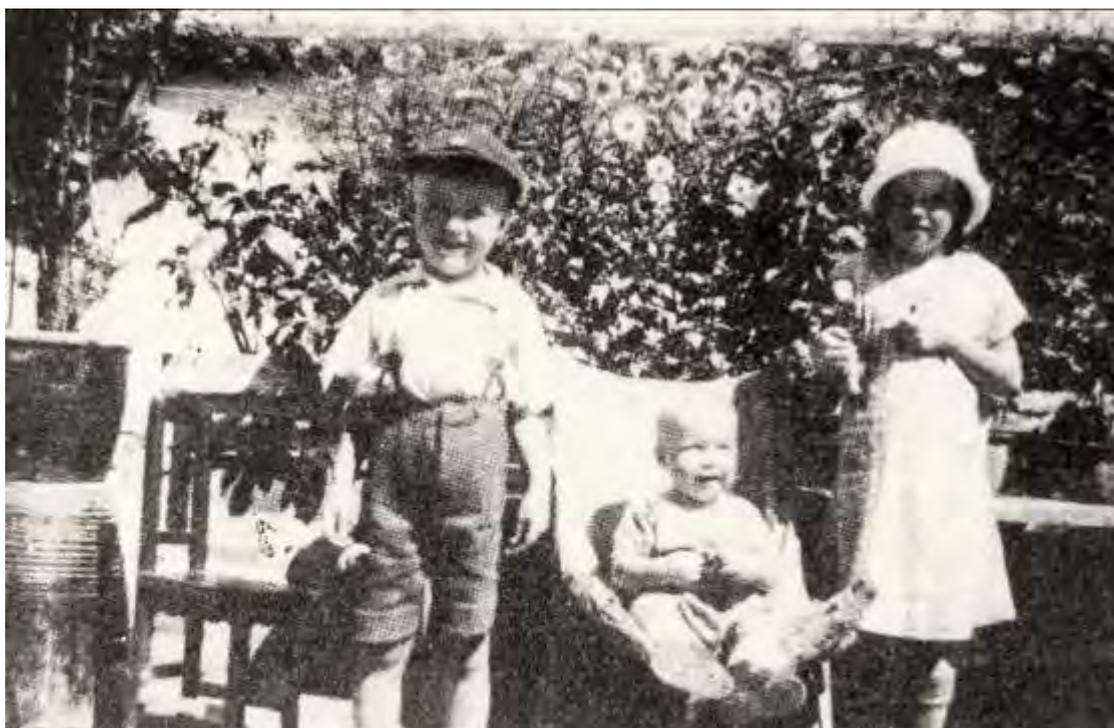
叶永青一家人：爸爸、妈妈、保罗和马利亚。



叶家的三个孩子：保罗、马利亚和但以理。
但以理 1928 年生于挪威，4 个月时来到中国。



保罗和他的朋友们在河曲教堂门口。



属基、马利亚和但以理在河曲家里的花园中。
属基 1931 年生于河曲。



1932 年一次礼拜后妇女们在教堂门口合影。
妈妈在臂抱着属基，前右是马利亚，前左为但以理。



马利亚骑着在一个独耳朵毛驴上，但以理和属基坐在两边，他们走了许多天才到山西大同的铁路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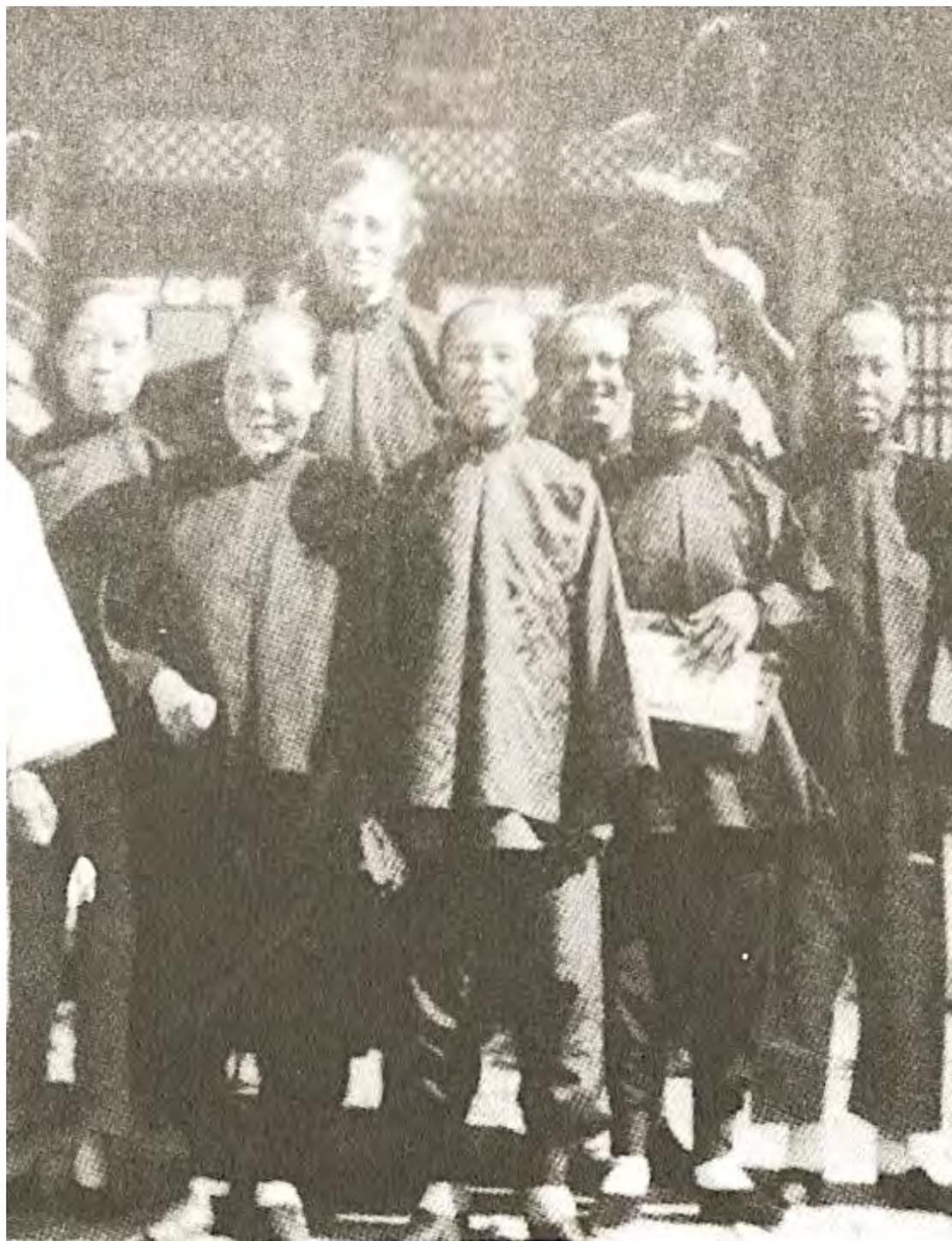
但以理和河曲孩子玩。



在叶家河曲家园挂的挪威国旗。



但以理和他的伙伴张继荣在河曲学堂门口。



河曲的妇女和挪威同工雪素媛教士及姚城一参加领导培训班。



一次礼拜后在教堂门口的合影，有“X”者是张税务官，有“E”者是老传道人秦桂煊。



老传道人秦桂煊和他的两位助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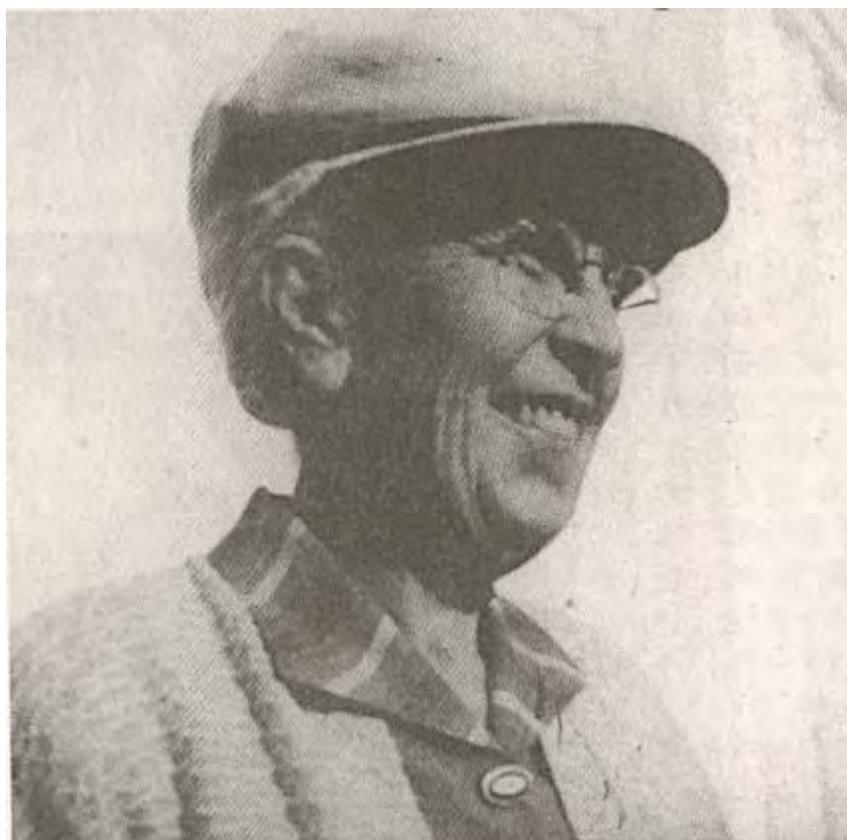
小周（周贵基）在河曲的婚礼。



1937年在挪威的最后一张全家六人的合影，
摄于再次退回中国的几周前。



1940年1月1日叶永青的送葬队伍。
他于1939年12月14日被日本飞机轰炸而死。



1956年叶妈妈带着但以理重访挪威。



叶妈妈和四个孩子。



叶家的四个孩子和他们的配偶。
叶家的八个成员在属基的挪威家中团聚。



叶永青的四个孩子



1990年8月10日，叶永青在山西被追认为烈士。
地方政府为他建立了一座大理石纪念碑。
叶永青的四个孩子侧立纪念碑旁，
马利亚边上是他幼时伙伴老李(音)，
保罗边上是老杨(音)，当年他与叶妈妈工作关系亲密，
属基旁边是老全，过去常住叶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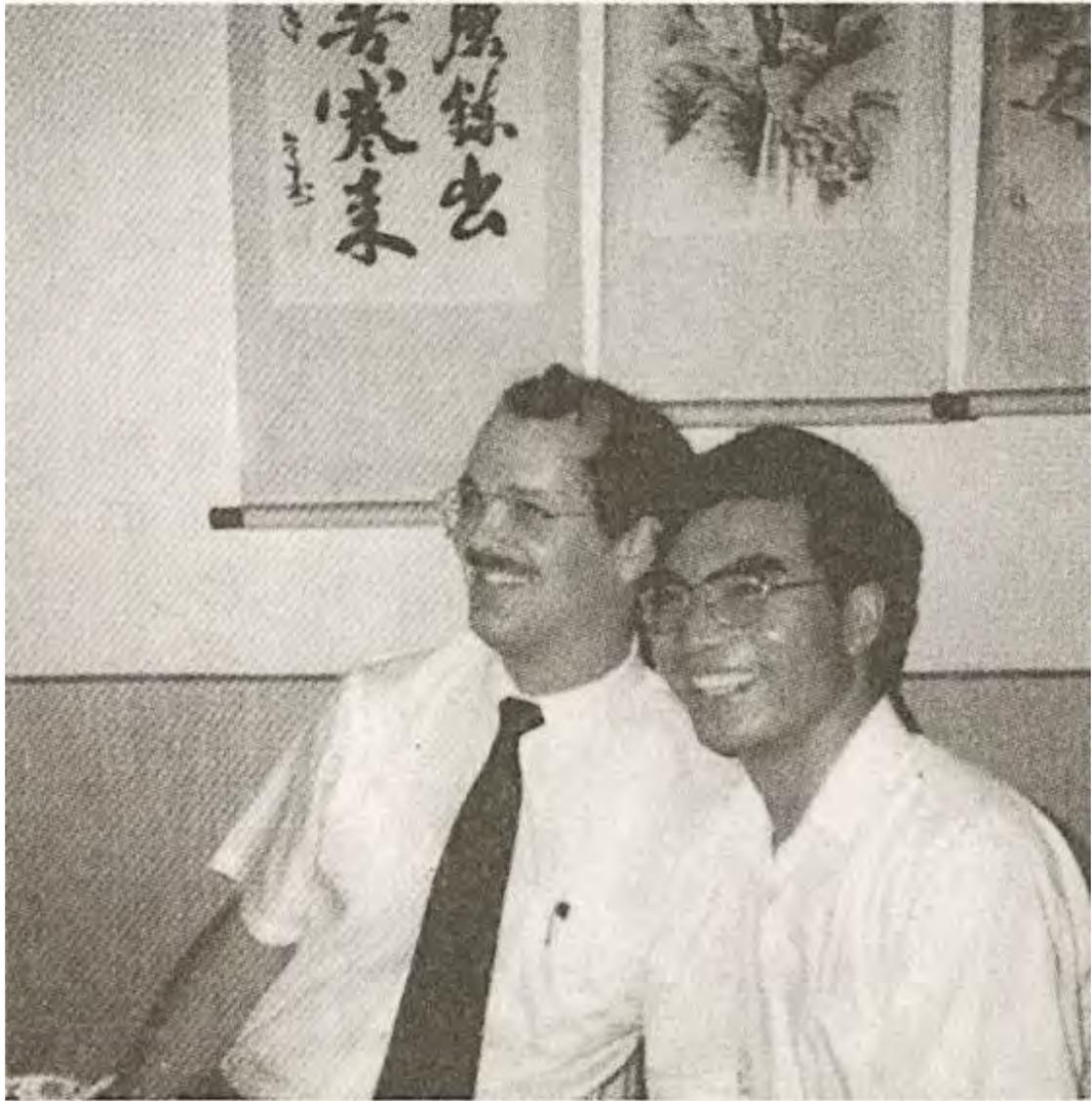


叶永青家族 16 位成员出席了叶永青纪念碑的揭幕仪式，他们从美国，挪威，印度尼西亚和乌干达来参加一盛典。除了叶永青的孩子外，还有两个他们的配偶，6 个孙子孙女，两个孙辈的配偶，以及叶永青的两个重孙女。

河曲的政府官员同他们合影，山西太原的张培英（音）大夫也出席了仪式。



在黄河滩上。但以理和他的儿子女儿，以及玛利亚的孙女们。



叶永青的孙子与 1993 年移居太原，建立了美国用情服务社。这是叶先生和河曲的梁先生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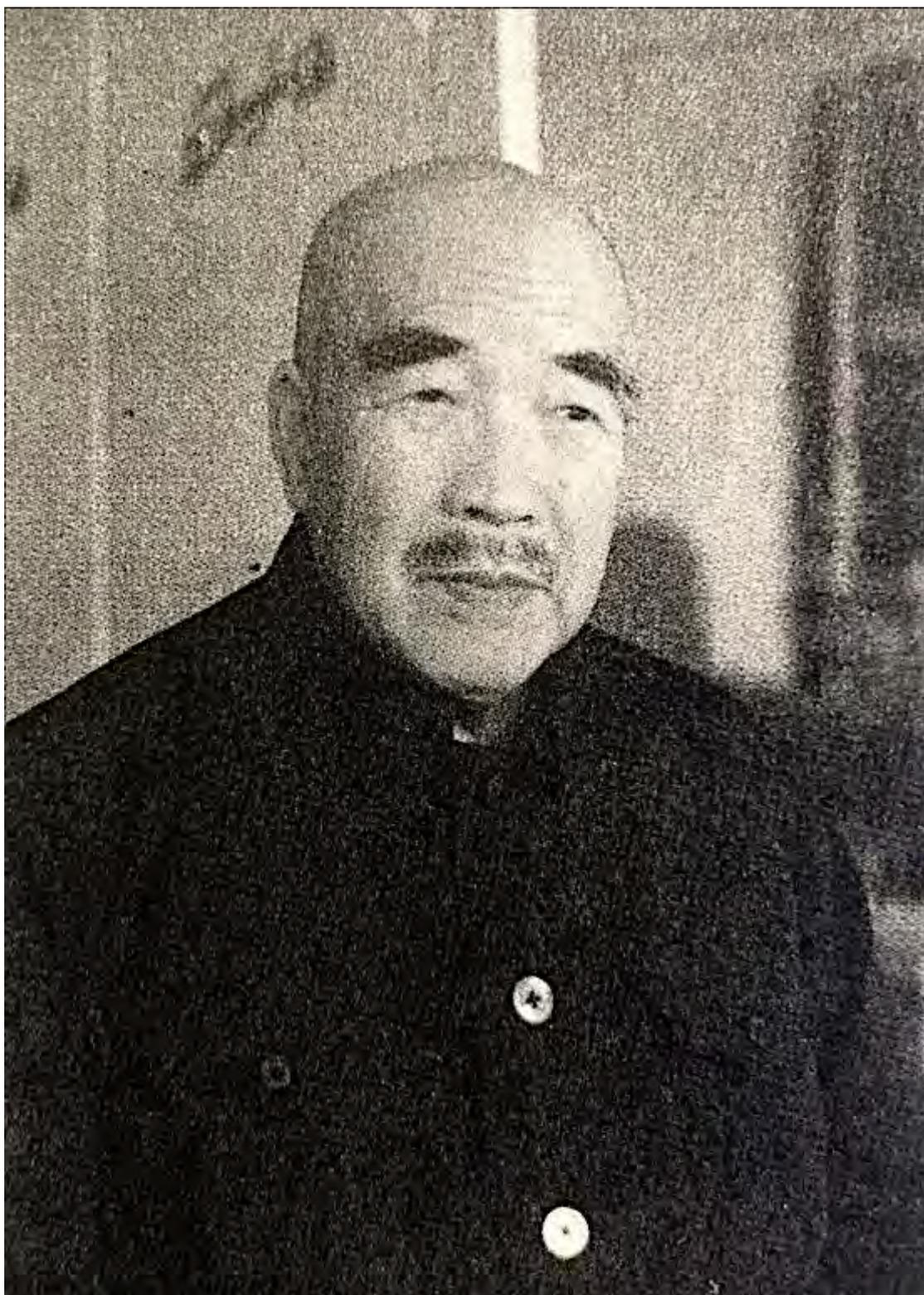
玛利亚的孙女在唯一未遭毁坏的墙前窗下留影，
这间房子是在 1939 年遭日机轰炸的。



玛利亚和老杨（音）以及她的孙子在河曲家中合影。



属基和老杨在河曲，摄于 1990 年。



叶永青牧师殉道时的同工聂思聪牧师， 摄于 1994 年元月。



作者夫妇在本书审校者家中。



叶永青家族 16 位成员（一位在拍照）被山西省副省长郭裕怀接待，他们从美国、挪威、印度尼西亚和乌干达来参加纪念碑典礼。除了叶永青的孩子外，还有两个他们的配偶，六个孙子孙女，两个孙辈的配偶，以及叶永青的两个重孙女。山西太原的张培英大夫安排家团的山西活动。



叶永青的孙子叶福礼(后排右手)带上配偶和双胞胎于 1993 年移居山西太原，建立了美国永青家庭服务社。另两个美国家庭同时参与山西工作，再次有张培英大夫(沙发中女的)协调。



叶永青的孙子叶福礼和他的配偶和双胞胎在纪念碑旁

葉永青牧師紀念碑

谨将此文献给我的父母，
他们把毕生献给了中国！

—叶玛利亚

目录

第一章	来到中国.....	1
第二章	4个孩子	3
第三章	幸福之家.....	5
第四章	1939 巨变之年	7
第五章	1939 年 12 月 14 日难忘的日子.....	9
第六章	亡夫之痛.....	11
第七章	天国的葬礼.....	13
第八章	生命的追忆.....	15
第九章	劫后余生.....	17
第十章	母亲与八路军	19
第十一章	相聚在山东	21
第十二章	何日回故乡	23
第十三章	命运之门.....	25
第十四章	故乡之恋.....	27
第十五章	1990 恩典禧年	29
附录一	我与叶永青牧师	32
附录二	叶永青牧师纪念碑碑文	35

第一章 来到中国

我的父亲叶永青 1910 年在挪威第一次听到有关中国的故事时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当时的挪威人并不了解中国。17 岁的父亲和伙伴们走很远的路到附近的村子去听有关中国的故事。一位老人告诉他们，中国人还从未听到过耶稣基督的福音。父亲也想亲眼到中国去看看。

有一次在讲座结束时，大家纷纷往一个篮子里放东西捐献给中国。我父亲倒空了他钱包里所有的东西，然后，他还写了一张纸条放在篮子里，纸条上写着：“还有我自己！”

在决定了要为中国献身之后，他的心里就只有一个目标：到中国去。首先，他去美国深造学业，然后他找到了工作，在教堂里为美国人和挪威人做事。但他的追求依然一如既往：“我必须尽快到中国去，那才是我的归宿！”

在 26 岁时，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在 1918 年来到了中国。经过两年多的强化语言训练，他自愿来到了从未有过教会的山西河曲。1921 年 11 月，他高兴地来到了河曲。我的母亲在经过两年的学习后也来到了这里。他们于 1923 年 1 月在山西岚县结了婚。然后他们骑骡子走了 6 天才来到了河曲的新家。当地的教友们热烈地欢迎他们的到来。

在来中国之前，我母亲已经接受了两年的护理培训，因为她知道中国是多么需要医药。在河曲走几天的路也找不到一个诊所，最近的

大医院还在太原附近，要走 10 天的路。所以，当她开了自己的诊所后，许多病人就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看病。

与此同时，我父亲开办了一所小学校——育德小学。这是当地第一个教会学校。在饥荒年代，成百上千饥寒交迫的人们来到教堂寻求帮助。他们围坐在院子里，分享着热气腾腾的饭菜。埃德加·斯诺曾估计约有 500 万到 1000 万人死于 1929 年到 1931 年发生在中国西北部的大饥荒。

当时，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文明人过着优裕的生活，而内地的贫民却没有这种好运。我们的家和教堂正是向着贫民开放的。

我的父母懂得，人是物质和精神的组合体，这两方面都需要营养。我们的精神 缺乏与上帝沟通；而我们的肉体缺乏必要的食物。有的人到教堂来只求食物和药品，有的人来既要食物也要上帝，我的父母对他们都一视同仁。他们的理想就是彰显上帝无条件的爱。我们不是在索取而是在获得。我的父母是多么热爱河曲人民啊！

第二章 4 个孩子

我的哥哥保罗 1924 年出生在河曲，这给我的父母和他们的中国朋友带来了极大的欢乐。我母亲在写给挪威的家信中说：“男女老少纷纷跑来看望我的儿子，他对每个来看他的人都甜甜地微笑”。在他两岁以前，我母亲就抱着他走遍了全城。她在信中还写道：“每星期有三个上午我去教堂教姑娘们念书，另外三个上午，我去拜访村里的妇女们。保罗跟我一起去，他很喜欢这种活动。在中国，妇女是不能单独抛头露面的，但我可以，因为我有我的儿子作护卫。”

我是叶家的第二个孩子，1925 年出生在界河口。那个地方在岚县的山上，在山西的挪威人夏天都喜欢到那里去避暑，同时也躲避夏天流行的瘟疫。在我满月的时候，一辆骡抬架窝子载着我们全家走了五天才回到了河曲的家。我的教名是马利亚。

我 10 岁前都是在河曲度过的，只回过一次挪威探亲。我记得当地人第一次见到我们时管我们叫“洋鬼子”，因为大多数人之前从来也没见过外国人。可是他们一经了解了我们以后，大家就变得非常友好。我有许多中国小伙伴，和他们在一起，我度过了幸福的童年时光。

我很喜欢吃中国饭，尤其是加了辣椒的饭菜，比我们挪威只加盐的白水煮青菜好吃多了。所以，每次在饭桌上我都假装不饿，然后趁我父母忙着的时候，偷偷溜进工人的厨房，狼吞虎咽地吃起火辣辣的

中国饭，直辣得我“泪流满面”。

1928年，当我们回挪威探亲的时候，我的弟弟但以理也来到了人间。我还清楚地记得回到河曲后，他一直戴着一顶漂亮的小帽，长长的帽檐遮挡着刺眼的阳光。那是一位河曲的裁缝做的。弟弟经常把帽檐歪到一边。人们问他是谁做的帽子，他总是回答说：“是木匠给我做的。”

我们家的第四个孩子属基 1931 年出生在河曲。我们的许多中国朋友都为我们高兴，因为我父母已经有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们都说这是“好福气”！很多年以后，属基在中学回忆他在河曲度过的童年时说：我记得我童年时代在中国北部长城脚下的家。那是用泥砖和草秆搭的。在院子里，我们种了好多美丽的鲜花；还有两面旗子，一面是中国的国旗，另一面是挪威的国旗。在院子的外面我们种了西红柿，还养了五六只小羊和小鸡。我记得我的大姐姐总是特别关心我。每次我要挨打时，她都为我难过，有时甚至替我挨打。有时，我哇哇大哭，特别需要安慰，她就会把平时积攒下来的糖果给我吃，我就破涕为笑了。我还记得一位中国妇女王大嫂，她是来我家帮忙照看我们的。她对我们照顾得无微不至，还经常讲一些动人的仙女故事给我们听。”

第三章 幸福之家

我们 4 个孩子每天都喜欢爬到我母亲的床上去。我父亲每天都要做晨祷，所以他每天早晨 5 点钟就起床走了。我们 4 个孩子总是争抢着靠近母亲。我父亲是从其他方面给予我们父爱的，他喜欢给我们说笑话。冬天时，每当他长途跋涉步行或骑骡子从远处赶回家时，他常常会感冒。这时，我母亲就会很体贴地照看他服药。但他却宁愿用中医的偏方，用开水冲服以辣椒、姜粉和蒜末做成的药。然后，他并不上床休息，而是去跑步发汗。“你一躺下，寒气就会钻进你的身体。”他经常这样告诉我们。如果还流鼻涕，他就会用一个大床单去揩并夸张地说，他的手帕太小了，对付这么严重的感冒不够用。这常常逗得我们这些小孩子捧腹大笑。

在河曲，由于没有公路，所以不适于开车，而我父亲却连自行车也不愿意骑。他说，如果骑车就会错过机会和那些想跟他聊天的人说话。所以，如果路不太远，他就总是步行。有一天，一个人走过来跟他搭话，我父亲以为他是对耶稣发生了兴趣，因为他说话的时候跟我父亲越贴越近。最后，我父亲问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是的”他说“您买这副漂亮的墨镜花了多少钱？”

我父亲喜欢给我们讲这类故事。因为，这可以使我们在这片贫困的土地上了解到生活有趣的一面。有一次，他告诉我们，在市场上没

有人会听他传道。所以，他第一次去市场时就买了一些花生和一碗茶，然后边吃边和人聊起来。不一会儿，他身边的人就越来越多，而他也把声音放大，让每个人都能听到，又过了一会儿，一些小贩也趁机来兜售东西。这时，我父亲突然喊道：你们知道吗？我家有 8 个儿子，我们现在都还活着。”这样，他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因为 8 个孩子都能活着在贫穷的当地人听来是一种难得的福气。后来，每当有基督徒在市场上跟人说话，人们就会过来问他：“你们那位家里有 8 个弟兄的人呢？”

我父亲为我母亲的诊所感到非常自豪，因为人们常常从很远的地方走几天的路程来看病，而离我们最近的大医院也得走 10 天的路。可我父亲有时也跟我母亲开玩笑。因为有一天母亲有了就一个竞争对手。有个人跑到太原，买了一些药品回到河曲，做起了药材生意。他还在太原请人教给他怎么写英文：我是大夫。但是，他回到河曲后，把这些单词搞混了，所以他的招牌写成了：“我是大夫吗？”直到很多年后，那仍然是河曲惟一的一块英文招牌。

河曲是个充满欢乐和友情的福地。逢年过节，很多人都来邀请我们去家里做客。我们在河曲老百姓家里都受到了欢迎。

第四章 1939 巨变之年

然而 1937 年当日本人侵入中国以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山西是几个受创最深重的省份之一。由于河曲是通往内蒙古的大门，于是便成了炸弹集中轰炸的地方，大大超出了这个只有一万人口城市的承受力。河曲也是个重要的战略要地，黄河在这里把山西与它西边的陕西分离开来，长城则把山西与其北面的内蒙古分离开来。

由于当时既没有战争灾难救援会，也没有红十字会或野战医院，我母亲的诊所里住满了伤兵（包括共产党的和国民党的），以及受了伤的贫民。同时，狂轰乱炸使许多家庭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于是，这些人也纷纷来到教堂栖身，有时多达 1000 到 2000 人挤在我家和教堂里，以及任何能找到可以过夜的地方。

战争初期，由于挪威是一个中立国，日本人答应不来轰炸。他们要求我们在院子里挂出挪威国旗，这样日本飞机从空中就可以看到。可是后来，有人报告日本人说我的父母在帮助中国军人和平民抗击侵略者，一切就改变了，我们变成了他们的敌人。

这一年日本人改变了对从挪威来的叶家人的态度，我们家也有了一些变化。我们几个孩子的早期教育是在河曲家里进行的，父母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在第二次回挪威探亲之后，于 1937 年返回中国，就在日本人入侵中国不久，我们转到了位于湖南益阳的桃花仑的一所

挪威人办的学校读书。

但是，在 1939 年，随着抗日战争的逐步升级，所有的挪威妇女都带着他们的孩子离开中国返回挪威。由于只剩下叶家的 4 个孩子，学校也关闭了。这迫使我们又转到了山东烟台英国人办的学校。这给我们增加了不少困难，因为我们只会讲汉语和挪威话。我们只和父母一起过了一个暑假，他们就离开了烟台，于 1939 年 9 月回到了河曲的家。

他们先坐船到达天津，然后乘火车到山西的宁武县，因为所有的骡子都被征用了，只好又骑驴走了 4 天才到了河曲。他们发现河曲的街道变得萧条而清冷，所有的大铺子都关了门，很多人远走内蒙古，因为那里战争较少。人们日日夜夜提防着空中的死亡大鸟扔下的致命炸“蛋”

河曲人民看到我父母回到河曲与他们同甘共苦，共患难，都感到欢欣鼓舞，教堂里又增添了许多新教友，大家全都赶来欢迎我父母的归来。从此，教堂又成了人们聚会的中心、躲避炸弹的防空洞以及疗伤治病的医院。这里也成了所有在残酷的日本侵略战争中受摧残的仁爱圣地。

第五章 1939年12月14日难忘的日子

我的父母此时还不知道由于他们帮助了河曲的中国人，包括平民和军人，日本人已经改变了对他们的态度。在12月14日这一天，他们照例在院子里挂出了挪威国旗，好让日本飞机能从空中看到。自1937年战争爆发以来，日本人就已“指示”所有来自中立国的传教士这样做。

那天，空中飞来了34架飞机，我的父母听到了这些钢铁大鸟的轰鸣。我父亲跑到院子里，抬头仰望天空，然后飞快地跑回屋内告诉我母亲，他们已经来不及跑到只在一个路口以外的教堂防空洞去了。

“我们得待在这里，赶快钻到床下去！”他告诉我母亲。日本人显然是有预谋而来的，他们利用了日本特有的俯冲式轰炸，目标正是我家和教堂。我父亲还没来得及完全躲入床下，而我母亲则刚刚弯下腰，便传来了第一颗炸弹的爆炸声。

那一声尖利刺耳的声音破空而来，这是他们从未听过的。震耳欲聋的爆炸把他们包围了。危机前后只持续了几分钟，我母亲被巨大的声浪震倒，浓烟刺得她睁不开眼。然而她随即意识到土墙已经坍塌在她亲爱的丈夫身上了。由于我母亲身体瘦小，因此她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很容易地掀起，然后抛到一堆碎石、碎玻璃和碎木块上。在这一瞬间，她听到了我父亲在被埋进倒塌的房屋前发出的一声撕肝裂肺的

喊声。母亲从废墟上站起来的时候四周都在燃烧，她孤独地站在那里，茫然四顾，不知所措。她的中国朋友们大多已躲进了防空洞。只有 5 位妇女和她在一起，她们都裹过小脚，而且她们中已有 4 个人年过七十。

多亏了上帝的仁慈我母亲才得救。她感到四周的空气沉重而昏暗，充满了受伤者的呻吟。这时，她的中国朋友们纷纷从教堂里跑出来帮助她。他们用了半个多小时才从乱石堆里挖出了他们深爱的牧师。老全告诉我们，父亲是被房梁击中的，房梁正好掉在我父亲藏身的床上。由于墙是用泥砖垒的，所以很容易倒塌。老全还记得当他们把叶牧师从废墟里挖出来时，我母亲在一边不停地说：“小心他的头！”然而他的头部受了严重的创伤，已经停止了呼吸。

第六章 亡夫之痛

作为一名护士，我母亲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来挽救她的丈夫，他们甚至连人工呼吸都试过了，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终于，母亲不得不强迫自己承认：他已经去了！母亲开始在已经变成废墟的家里寻找可用的东西来为父亲洗身，并且为他准备葬礼。外面不断传来受伤者痛苦的呻吟，我母亲只得暗自庆幸我父亲无伤无痛地离世。

四天后，我母亲在写给挪威的一封家信中说：“直到午夜时分，他才被装裹停当，静静地躺在那里。他看上去漂亮而安详——甚至有一丝微笑显现在他的脸上。我们忠实的同工老聂和老王自始至终在帮助我。这时，他们才坐下来，暗暗垂泪，就这样我们坐了很久很久。我们已经忘却了一切，只是相对流泪。”

他们似乎还不能相信这个事实，不相信彼得就这样永远地倒下去了。他们说，他是为我们而死的！不论是帮工还是在教堂里的人们都在悲伤流泪。由此，我愈加坚信，河曲的人民与这位外国朋友——这位传教士的关系有多么亲密，他们是多么敬爱他啊！

由于在后来的日子里河曲仍然不断地遭到轰炸，我母亲和其他挪威女教士找到了一处接盖在长城上的房屋并把它租了下来，这下他们就有了最坚固的防空洞。这样，白天他们在城边较少炸弹的地方度过，夜晚才返回城里的家。教堂里的人都劝母亲为了我们四个远在山

东烟台的孩子也要注意安全。

就在他们寻找一块墓地的时候，轰炸仍在不停地进行。12月14日这一天，日本人在这里投下了250到300颗炸弹，而在后来的日子里，平均每天有60颗炸弹落到河曲。

母亲翻山涉水，四处寻找墓地，然而，她发现没有人愿意卖给她一块墓地。大约50年前的中国，坟茔不仅是一块掩埋尸体的地方，也是死者的灵魂享受礼拜的地方。按照当地的风俗，生者每年两次带着食物和水酒来到祖辈的墓地祭奠。他们认为祖先的灵魂会来享用子孙的供祭。还要烧一些纸钱、纸衣、纸屋和纸轿给死者在阴间使用。出于担心一个外国人会惊散祖先的灵魂，人们不敢把我父亲葬在自己的祖坟地里。最后，还是一位基督徒在他的农田里划出一片美丽的土地。我父亲于1940年1月安葬在那里。

第七章 天国的葬礼

在葬礼进行以前，我母亲写信给挪威的家人，诉说了人们对我父亲牺牲的反应：“上帝以强有力的方式告诉这个城市的人们发生了什么。如果上帝能够看到如此巨大的牺牲唤醒了人们去接受来自十字架的福音——这正是彼得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那么，我们全家依然乐于为主做出这种奉献！”

正当准备进行葬礼的时候，我父亲的好朋友，挪威牧师霍玟（霍牧师已于 1993 年 6 月 16 日在故土蒙召归天，享年 91 岁）骑驴走了四天，从兴县赶到这里。他记述道：“我在河曲看到的是怎样的景象啊！一排排房屋倒在废墟里，到处都是可怕的轰炸后还没来得及掩埋的尸体。从那个瓦砾堆上依稀可以辨认出那曾经是彼得的家园。一些虔诚的年轻信徒正在紧张忙碌地准备着葬礼的工作。由于教堂只剩下了残垣断壁，只好搭起了一顶大帐篷。帐篷内外都装饰得很漂亮，人们灵巧的手把爱的怀念扎进了圣洁的纸花，地方上也送来了写有各种悼词的旗幡。追悼大会是 12 月 31 日举行的，成百上千的人赶来参加，帐篷内外站得密密麻麻。”

在帐篷的入口处，高悬着一幅绸制的灵幡，上面写着：“他为拯救世人而奉献了自己”。在帐篷中间停放着一口灵柩。教友和朋友们敬献给我父亲的挽联、挽幛都是白色的，只有一位德国的天主教神甫

带来的是黑色的绸幡。很多人站在那里默念着敬献给我父亲的悼词。只有那位神甫说出声来：“他为了他的朋友们而献身，人间的爱莫大于此！”这是基督的语录。

为了避开轰炸，葬礼是从第二天凌晨开始的，这已经是 1940 年 1 月 1 日了，我母亲曾记录了葬礼前夜的情景：“整个夜晚，那些年轻人都在守灵。他们围坐在帐篷前的一堆篝火旁，唱着对上帝荣耀的赞美歌，每个人都在歌中倾注了对救世主的感恩。这足以说明了基督徒的与众不同：我们有上帝给予我们的最后慰藉，我们没有绝望者的痛苦。”

第二天清晨，人们很早就来了。很多妇女根本就没有回家，而是在这里坐了一个通宵。经过约 45 分钟的准备，我们迎来了新年的第一个黎明。在这个名叫水草谷的吉祥地方，母亲最亲爱的丈夫，我们最敬爱的父亲永远安息在了中国的黄土地上。

第八章 生命的追忆

霍玟牧师在寄往挪威的信中更详细地谈到了葬礼。他写道：“无论是在帐篷中的礼拜上，还是在遗体安葬仪式上，都笼罩着一片惊人的寂静。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我们的心已经被充满了。十八个身强力壮的信徒抬着他们的牧师走向最后的安息地。很多人打着灵幡、挽联走在灵柩的前面。其中一面挽幛上写着：优秀的领路人为我们而死了。”一大群送葬的亲友走在棺材的后面。墓地离城有 4 里多路。

我母亲的女同事也写信给挪威的家人：“我的朋友和同事叶弟兄经常谈到十字架。在街上，在教堂里，在去村子的路上，他都希望有十字架带来光明。此刻，我觉得十字架正在灵柩上对我诉说着什么。红色的十字架装饰着各色各样的纸花竖立在灵柩上，朝阳使他显得更加鲜艳。”

“在生活了 20 年的河曲，叶弟兄走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他的中国朋友们也经常称赞他很能吃苦。他从不吝惜自己而把十字架的福音传播到每一个偏远的或被人遗忘的村庄。他的愿望就是：让十字架插遍每一个耶稣曾经到过的地方！”

正是上帝给了他妻子和孩子们力量，才使他们能够承受得住与丈夫、父亲离别的悲痛。孩子们在最后一封从山东烟台写来的信中写道：“我们为了耶稣而分离”。孩子们在献给父亲的挽联上写着：

“为了你给予我们的一切——向亲爱的父亲致以最后的敬意”然后用大字印刷体写着：“一切为了耶稣！”

我的父亲并没有给我们留下钱财或土地，他甚至终生没能拥有一处属于自己的房产，但是他却给我们留下了千金难买的东西，是他使我们懂得了什么是“无条件的爱”！上帝首先为我们树立了楷模，他非常热爱我们，为了我们的原罪让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我父亲教导我们要以接受这份宝贵的礼物来报答上帝的爱，我们用爱来报答上帝。上帝帮助我们爱身边所有的人——富人和穷人，好人或坏人，乃至一切国家和一切宗教的人。

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父亲的榜样！他是那么热爱河曲的人民，以至于不惜为之牺牲生命！正因为我的父亲留在了那里，那里的人民知道他为此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这时，人们才开始懂得什么是无条件的爱：既有我父亲那种与人民生死与共的爱，也有上帝派耶稣来到人间，在十字架上为所有的人——包括河曲的平民百姓——而献身的爱！

第九章 劫后余生

我们叶家四兄妹当时正在山东烟台上学，12月23日收到家里的电报才得知我们亲爱的父亲已与12月14日去世了。起初，我们觉得失去了父亲，生活从根本上动摇了。一位我最喜欢的老师来告诉我：“你看上去好像所有的快乐都离开了你。”然而我们自始至终都对我们的主——仁慈的上帝怀着孩童般的赤诚，相信他会照顾我们这些失去了父亲的孩子。我们对上帝的忠诚一天也没有动摇过。我们有幸作为孩子，对生活无忧无虑，也不必去做上帝要求大人去做的事。因此，耶稣说：“除非你变成一个小孩子，否则你将不可能进入天国。”

自然，我们需要尽快见到我们的母亲，我们也为她在河曲的安全担心。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位至亲，绝不能再失去另一位。但是，我母亲写信来给我们解释说：她还要为河曲人民负责，她说她不能离开那些“失去了领路人，无家可归的教友”。

到了1940年5月，教堂的事才开始稍有起色。教友们自愿出资购买了一块地兴建教堂。母亲说：“我们的家和礼拜堂是被摧毁了，那也曾是我们上帝的家。但是教友还在，是那些“空中死亡之鸟”所消灭不了的。修建教堂的钱很快就被筹集起来了，这样的愿望以前在河曲是从来没有过的。刚到5月份，合同就签订了，这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是终生难忘的！我们又有了礼拜堂、学校，小礼堂和供男人，

女人分别使用的接待室。”

在河曲大轰炸之后，一些人告诉基督徒们说：“现在你们的教堂成了废墟，你们的牧师也已经亡故，基督教会恐怕在河曲就要完了。”他们说这种话，并非讽刺，而是带有宿命的意味，认为教会在河曲的好日子已经结束了。

“不，不是这样，”两位身为当地商界领袖的基督徒回答：“我们依然存在，我们就是教会！”他们懂得教会既不是一座建筑，也不是一个牧师，而是“蒙神恩召，聚集在一起，敬拜神的一群活生生的人。”正是这些人代表河曲所有教友给我们四个孩子写了一封难忘的信：

亲爱的孩子们，请接受我们由衷的致意和诚挚的情感！你们失去了至亲无尚的父亲，而我们永远与你们在一起。我们愿意分担你们深藏心底的悲哀与痛苦，尽管我们无法减轻你们的哀痛，但我们能帮助你们向天父祈祷。我们相信你们将因此得到慰藉，获得力量，肩负着我们苦难的上帝会来安慰你们的。

第十章 母亲与八路军

在山东烟台，我们四个孩子听说母亲有了一个安靠在长城上的安身之地都感到欣慰，这给了我们一种安全感。我 8 岁的小弟弟写信给母亲说：“我希望新房子能非常漂亮……很高兴炸弹炸不到它——你亲爱的孩子属基。”

很多八路军也来到母亲藏身之地看望她，表达他们对她的丈夫为中国而献身的感激和同情。他们也问到了基督教。母亲给他们看有父亲和我们四个孩子的照片，他们个个眼含热泪。有人说，在此之前，他们只知道会为共产主义而献身，现在他们亲眼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事。他们很高兴看到我的父母如此热爱中国，也亲眼看到了耶稣无条件的爱。

1940 年 4 月，我们又受到另一个打击：德国人侵入了我们的祖国挪威。我母亲记述道：我刚刚失去了一切依靠，现在看来连我亲爱的挪威也保不住了。但是，请记住，在地球上我们不过是匆匆的过客，天国才是我们的永远的家乡。

这时我母亲万分高兴地收到了一封著名共产党人贺龙将军的亲笔信，信中表达了他对挪威被德国侵略者占领的同情。这次与贺龙将军的联络比原来想象的简单。日本人持续不断的轰炸打破了乡村警察和城市私人武装之间的联系。贺龙将军的队伍就在这片真空地带与国

民党军队联合起来抗击日本鬼子。

我母亲写信给挪威的朋友，告诉他们有关这些共产党朋友的事：

我和他们相处得很融洽，他们非常亲切友好。当看到我丈夫的照片时，他们称赞他是为了这块土地而献身的。这时，我感受到上帝的仁爱显现在了他们身上。然后，他们又看了孩子们的照片，他们认为有 3 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非常幸运。他们非常友好，而且一再表示还会再来。他们中有一些人后来不断参加我们的聚会。

到了 1940 年 5 月，我母亲才对她的朋友们在河曲的处境放下心。这时，她感到该去山东烟台看望她的孩子们了。可是，从河曲到海边要走很远的路。首先她得向西北方走八天，经过鄂尔多斯沙漠到内蒙古包头，然后再乘火车和船向东北去山东。80 岁的孙爷爷自告奋勇作她的旅伴，他告诉母亲：“我已经活得够本了，在我死之前要为上帝再做一件事，就是帮助你去山东找你的孩子们。就算我再也回不了河曲，那我也认了。”

第十一章 相聚在山东

当 8 岁得属基听说母亲要进行危险的旅行时，他就从烟台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亲爱的妈妈，我祝愿您一路平安，碰不上拦路抢劫的强盗。上帝将与您同行，所以您一定不会吃亏。”直到母亲抵达了烟台之后，我们才听说了她在一路上遇到的风险。每一次危险的遭遇都发生在她渡过黄河，从中国守军一方来到日本人驻防一方的时候。那些盗贼出没，行人无不闻风丧胆。在一次遭遇中，突然有一位高级中国军官骑在马上向我母亲亲切打招呼：“您还记得我吗？我上过您教的礼拜天学习班”上帝保佑！这个人小时候去河曲教堂，他保护着母亲通过了危险区。在河边，很多人在等待渡河，但是母亲和老孙没有日本人发的通行证。这时，人群中又忽然有人给了他们一份通行证，这样大家才高兴地看着他俩通过了黄河渡口。

在通过鄂尔多斯沙漠时，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所以大家全都好奇地看着母亲——一个瘦小的白种女人坐在大车上，赶车的是一身古旧装扮的老孙。第二天夜里，他们来到一家旅店，那天早晨刚有三个客人被杀死在客房里。第三天，他们遇到一伙散兵游勇，用抢驱赶着他们赶路，然而他们奇迹般毫发无损。第四天夜里，他们来到一家蒙古人开的毡房客栈，这里的客人五花八门，仅在他们住的大通铺房间里就有三十多个鸦片烟鬼。“孙爷爷不住地默默祈祷，”母

亲后来写道“如果不是上帝看顾，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当我们四个人到烟台码头去接母亲的时候，全都禁不住欢呼雀跃起来。母亲是从天津的塘沽坐船来的。船一靠上码头，我们立刻就看见母亲微笑着站在甲板上。在她快步向我们走近的时候，我猛然发现：自从她上次离开我们后才仅仅十个月的时间，她的头发已经从金黄变成了灰白。这就像有一把尖刀刺入了我的胸膛一样难过！她一走下踏板，我们大家就全都痛苦地发现她那样快地衰老了。我们立刻围上去，七嘴八舌问长问短起来。

我们劫后余生的家人团聚在一起，兴高采烈地度过了暑假。我们用了很长时间谈着分手后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在烟台秀丽的海滨游泳，大海离我们家近在咫尺。可惜，三个月转眼就过去了，学校又要开学了。母亲决定返回她心爱的河曲。但她刚到北京就发现日本人根本不给来自同盟国的外国人通行证去山西的任何地方。那年秋天，她就一直滞留在北京，希望能等到通往河曲的大门敞开。然而，一切途径都无济于事，于是，她只好在圣诞节前又回到了我们的身边。

在烟台，她积极地帮助“内地会”工作。1941年12月8日，日本人把所有来自同盟国的外国人统统软禁起来，我母亲却显出与众不同的高兴，因为无论如何她可以和孩子们在一起了。1942年11月，我们又全都被囚到了监狱。头十个月在烟台，后来转到山东潍坊的维新，一直到1945年8月的战争结束。

第十二章 何日回故乡

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我们却仍旧被迫待在监狱里，直到攻占了监狱的盟军能够把我们各自遣送回国。所有的 1500 名囚犯都疑虑重重。我们问那些军人谁会来接管我们？我们也问来探望我们的中国朋友，在我们被遣送回国之前能不能先回河曲？来自各方面的回答都是“不行”或“不知道。”他们解释说日本人离开后，解放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内战就又要开始了。就这样，我们连河曲的家都没能回去看一下，就怀着深深的哀痛于 1945 年底离开了中国。

到了 1948 年，保罗带着他的妻子和儿子万分激动地回到了中国。可惜，战争又一次使他们返回河曲探亲的梦想化为泡影。保罗的目的是能渡过黄河到内蒙古去，因为那里的蒙族百姓还从未听说过耶稣基督。我父亲生前有一个愿望，就是一旦河曲的教会成熟自立了，他就搬到内蒙古去，然而他却壮志未酬身先死。保罗挺身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他走遍了宁夏、青海和甘肃西北部，访问了许多蒙古族的聚居地。他们全家住在兰州，并在那里学会了蒙语。

然而由于当时的西北军总部给他们规定了很多限制，解放军又迅速地逼近，战争迫在眉睫，他们只好于 1949 年 8 月离开了内地，远赴香港。谁能想到，在离开中国之前，他们却不得不在中国的黄土地上又添加了一座叶家的坟茔，他们的小儿子大卫出生在兰州，

由于急病不治，于 3 个月后死去，和他爷爷一样也被安葬在了中国。

保罗和他的妻子继续在台湾向中国人（汉人和蒙古族人）传道，直到 1970 年。当时台湾的土著阿美族人没有翻译成他们自己语言的圣经，保罗也是一位语言学家，他承担了这个任务，加上与别人合作，现在阿美人终于有了他们自己语言的圣经。1952 年，我母亲也来到了台湾和保罗一家住在一起。在看到所有外国人都离开了中国之后，她也不得不放弃了重返河曲的梦想。然而，在台湾，她至少还能和从大陆来的中国人住在一起。在那里，她成了许多原籍在大陆的人的母亲，和他们一样，她也深深怀念着中国。在那里，每个人都是远离故乡的游子，他们都能理解她对中国的家——河曲的热爱。作为她的女儿，我陪伴母亲来到台湾，在台湾大学外国文学系担任教授。我曾经幻想在大陆教书，但既然那是痴人说梦，我也只好退而求其次——在台湾与从大陆来的人生活在一起。

那些从大陆逃出来的士兵在台湾这块陌生的土地上感到深深的失落，他们最需要得到上帝无条件的爱，很多人从上帝的福音里获得了莫大的安慰。那几年，对我们来自大陆的叶家人来说是幸福而有意义的。然而我们全家人却一刻也没有放弃过我们的梦想——重返我们在中国河曲的家！

第十三章 命运之门

许多年过去了，我们只能望海兴叹，再没有了来自大陆的学生或军人能告诉我们中国的情况，我们与河曲已断绝音信达数十年之久，我感到我的生命里失落了什么，我们叶家的“根”被砍断了！我再也见不到那些曾经疼我、爱我，给过我无限欢乐的中国朋友了，我再也见不到我生命的摇篮了！

终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四人帮”被逮捕了，邓小平复出了！中国的大门又一次缓慢地，然而坚定地打开了。渐渐地，我们开始与来自中国的学生又有了接触，他们都是来美国深造的。只要一看见这些学生，我就向他们询问有没有听说过在山西和内蒙古交界处的河曲。令我极度失望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听说过那个地方！他们随后告诉我有些城市是开放的，有些是不对外的。我在中国大使馆里又亲眼见到了标有这些城市的地图，这意味着打听一个不开放的城市根本就是徒劳无功的。

到了 1987 年，奇迹发生了！一位来自山西太原的儿科医生张大夫来到这里看望她在明尼苏达大学读博士的儿子。她的儿子同时在离校园不远的教堂里向一位热爱中国的基督徒教师学习英语。这位教师在见到张医生后，决定把她介绍给一位美国医生，并且邀请了一些朋友在她家开晚会。她出于两个原因邀请了我的弟妹：第一，我的弟妹

也是儿科医生，是张医生的同行；第二，这位教师想起来，我的弟弟也来自山西，和张医生来自同一个省。正是山西这个地方使我们接上了头。

我弟弟第一次见到张医生时，照例不抱希望地问起那个千篇一律的问题：“你听说过河曲吗？”令他大吃一惊的是，张医生回答说：

“是的，我不仅听说过河曲，它还是我所负责的医疗管区呢！”我弟弟立刻迫不及待地拨通了我的电话。他说：“天大的喜讯！我见到了一位知道河曲的人！这样，我也激动万分地见到了张医生。

张医生立刻答应帮助我们到河曲寻根。“你们不是旅游者”她强调说，“我要告诉省政府不要把你们看作旅游者，他们会知道，你们是河曲的儿子和女儿，你们要回家！”

仅在张医生答应帮助我们的一年以后，我的丈夫和我就来到了太原。张医生和她的丈夫钱医生陪伴我们度过了 1988 年的中国农历春节。张医生已经办妥了我们“回家”的手续，并且亲自护送我们回到了阔别 40 年的河曲。但以理的妻子应邀参加了 1988 年 6 月在山西召开的医学会议。他们也回到了久别的河曲，住了整整一个夏天。对但以理和我来说，这真是一次难忘的探家！重归河曲，我的整个身心都充满了故乡的温馨！

第十四章 故乡之恋

更为惊奇的是，我们在河曲时还见到了童年的伙伴。当我们应邀出席由河曲县政府举办的欢迎晚宴的时候，县长从我影集里的一张旧照片上认出了他的父亲，这令他又惊又喜。他的父亲，就是当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老全。他也立刻被请来了，一进门他就兴高采烈地喊着：“玛利亚来了！”

随后，老叔也来了。他的侄女李桂英是我童年的伙伴。接着，镇上所有记得我们家的人都来了，邀请我们去吃饭，使我们感到从来就没离开过这里。我们还见到了郝琳医生，她还记得我家很多的往事。她现在是县总医院的院长。县医院就在我们住的宾馆旁边，那是一座相当漂亮的建筑。今天的河曲已经今非昔比了！这些巨大的变化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过去我们得骑骡子走8天到10天才能到太原，而这次我们的汽车行驶在柏油马路上，从省府沿着黄河只走了8个小时就到了河曲。

看到人们都住在整洁的砖瓦房里真令我们高兴。在我的童年时代，那些低矮的土房一到雨季就四分五裂。而现在孩子们都长得白白胖胖的，一看就知道身体健康，营养充足。在河曲再也看不到面有菜色的饥民了，女孩子也能跟男孩子一样受教育了。旧地重游，我们见到的却是一个崭新的河曲。老全带着我们去看我们的旧居，换句话说，

是看当年轰炸后的遗迹。在当年的废墟上后来又盖起了新房，主人极其恭敬地迎接了我们。

老全和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还带着我们去瞻仰了我父亲的墓地，他们还都清楚地记得他。我们可以体会到这块墓地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它在无声地诉说着我父亲当年如何选择了这块黄土地，深深地扎下根来，与这里的人民同甘苦，他们相依为命地度过了战争最黑暗的年代。

尽管现在的墓碑被移走了，但是几乎每个人都能准确无误地说出墓地的位置。多少年的风风雨雨，它一直在倾诉着我父亲对河曲人民无条件的爱，什么也堵不住这块墓地的嘴！

当但以理和他的妻子于 6 月到河曲的时候，河曲县的领导向他们发出邀请，邀请我们整个家族在 1990 年到河曲来参加我父亲的纪念碑揭幕式。我们全家人又一次怀着急切的心情盼望重返河曲。我们四个在河曲长大的人自不必说：保罗、玛利亚、但以理和属基。就连我们的配偶和孙子辈都在等待。如今，我们叶家的 16 口人就要回家了！

还记得《圣经》是怎么说的吗？

“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到来，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耶利米书 17：7-8）

第十五章 1990 恩典禧年

对于叶家人来说，1990 年将作为恩典禧年和盛典之年永存心底。当年叶永青的生长于河曲的四个孩子于 50 年后的今天联袂重返故乡。他们和他们的儿孙们组成了浩浩荡荡的 16 人叶家探亲团。他们中的 12 人是叶永青的直系后裔，另外四个人是与叶家子孙结婚的配偶。

《圣经》上把第 50 年称为“禧年”，这时，“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回到自己的家。”“在禧年，每个人都应该返回他的故乡。”而对我们叶家子孙来说，这就意味着重返河曲的家园。在这恩典禧年，河曲县主管官员和山西省副省长都向我们发出了友谊的召唤。山西省政府正式邀请我们重返河曲参加我父亲叶永青纪念碑的落成与揭幕典礼，纪念我们的父亲 50 年前惨死于日本的飞机轰炸。

在河曲我们受到来自老一代和年轻一代的双重热烈欢迎。这无时无刻不在告诉我们，尽管叶家人已 50 年未履故土，但他们从来没有被遗忘。父亲叶永青虽已安息在河曲的大地上，他精神的绿树却依然在他朋友们的记忆中常青。一些年轻人告诉我们，虽然叶牧师活着时他们还没出世，但他们早已从他们的父母和祖辈那里得知了他，也得知了叶师娘。因此，这些年轻人觉得他们也早已结识了叶家人。

宾至如归的感觉为我们的合家团圆锦上添花。我们在朋友中，在宾馆饭店到处都受到热情款待。我们重游了孩提时代的故地，如：故

居旧址，还有闻名世界的黄河长城，少年时，我们曾在这里流连忘返，尽情嬉戏。

然而，最激动人心的还是为我们的父亲、祖父、高祖父墓碑揭幕仪式。许多朋友来宾聚集在风景秀丽的墓地。庄严的墓碑高两米，宽一米，基座前有石台阶可拾阶而上。在揭幕典礼上，我们全家人齐声合唱颂主圣歌。我们叶永青的四个孩子分别讲了话，孙子辈的叶福礼（Finn Torjesen）也发了言。

当地的政协副主席杜清泉先生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讲话。在他热情洋溢的讲话中，杜先生对叶家人为河曲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他指出：叶家人为河曲曾经付出过太多，甚至我父亲付上了他的生命！

我们禁不住热泪盈眶，这是告慰的泪水！回首往昔，面对今日，我们不由得为我们的父母对河曲做出的巨大牺牲而感到自豪、骄傲！成功的故乡之行让我们觉得找到了自己的根！我们深深地感到我们的父亲没有白死，他所追求的理想也从未被遗忘。河曲人民至今缅怀着他为河曲做出的巨大贡献。这一切表明，在父亲逝世后 50 年的今天，他的精神之树依旧常青。“尽管他死了，他依然在诉说。”

河曲之行的高潮是我们叶家人应邀到河曲去帮助河曲建设发展。特别是会说汉语的叶福礼（Finn）和他的妻子谭美（Sandy）首先受邀请去河曲开发合作项目。

恩典禧年，庆祝叶家第一代与河曲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50 周年，同时也开拓了叶家历史的新纪元！叶永青的精神在他的后代子孙和家

人中生根、开花、结果，并将更好地造福桑梓——河曲 开辟令人向往的远景！

附录一 我与叶永青牧师

一读《叶牧师一家在中国》后的回忆

1932年我从山西洪洞神学院毕业，蒙神召唤来到晋西北河曲县基督教会作传福音的圣工，遂与叶永青牧师同工多年，因此我对叶牧师印象很深。

读《叶牧师一家在中国》联想过去，叶牧师许多美好的见证、感人的事迹记忆犹新。

一 广传福音

叶牧师在中国的主要工作是要把耶稣救恩的福音传遍河曲各地。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会便有机便将信主得救和悔改的道理讲给人们听。我和他同工，经常到河曲较大的村镇，作为据点支搭帐篷传道。每天除了在据点早晚接待来人传道外，还要抓紧机会再到周围三、四十里的村庄，甚至仅有几户人家的小村也要为他们布道。所以，河曲县 700 多个大小村镇都有我们传福音、报喜讯的佳音，山山水水都有叶牧师的足迹。叶牧师迫切爱主的心使他为福音奔波，在河曲县的信徒中感受很深。

二 不畏艰险

叶牧师生活俭朴，平易近人。在乡村布道，和我毫不介意地住在

极为简陋的车马人行店，而且一起睡在土炕上。如果不看他的肤色，简直不知他是一个外国人。一次，夏天，我们在巡镇传道，叶牧师想到黄河对岸（段家寨）去传道（陕西省府谷县所辖）。这地方没有渡船，仅有牛皮筏子代船渡人。因水急危险较大，只能乘坐俩人。据说当地人如非不得已，是绝不冒险渡河的。可是他为了传福音给段家寨的人，不顾撑筏人的劝阻，竟冒险渡河。返回后，许多人为我们捏了一把汗。又有一次，我和叶牧师，牛载道三人在偏关县布道，听人说黄河边有几户人家，与外村很少交往，在黄沙狂风扑面、天昏地暗的天气情况下，叶牧师竟然顶风步行三十多里路去传道。诸如此类的事对叶牧师来说并非罕事，而是不胜枚举。

三 治病救人

晋西北山区在那时很贫苦落后，没有西医和诊所，人们患病——特别是传染病无法求医问药又无钱治病，只好束手待毙。叶牧师看到这种情况，由于主爱的激动，更是难过万分，心急如焚。叶牧师特备良药为河曲信徒及不信教群众精心治病送药，并向群众宣传预防、隔离、避免传染病的常识。叶牧师夫妇的爱心在河曲全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所以，在叶牧师被日寇的飞机炸死的消息传开后，许多人都为之悲痛。

四 舍身取义

抗日战争爆发的那年，叶牧师怀念他的老家——山西河曲。他是挪威人，在日寇侵犯华北的要紧时刻，他离开挪威（度假）将妻子儿

女安置在湖南益阳，他只身绕道内蒙古包头返回河曲。他回河曲时，正值日军进犯河曲的前几天。当时，汉奸和地方士绅为了讨日寇的欢喜以“维持会”的名义邀请叶牧师参加迎接日军的活动，被叶牧师断然拒绝。叶牧师对日军侵华的罪行痛恨至极。我晋西北教会同工参加“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西北分会”（设在西安）成立了“晋西分会”河曲是第四医疗队，转为抗日将士们做救死扶伤工作，晋西分会设在山西保德县红十字会医院。1939年冬，日机轰炸河曲教会，保德县全城为之烧光，都与我教会全体传道人员一致抗日，遭到敌人报复有关。所以，当为叶牧师追悼会之时，贺龙将军，关向应政委特派一位科长由兴县专程来参加追悼会并慰问叶师母，真正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叶牧师与河曲信徒及人民同生死、共患难的高贵品质，是舍身取义的具体行为。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的身影却永留在我们的心中。

聂思聪

1994年元月

附录二 叶永青牧师纪念碑文

牧师叶永青先生一八九二年生于挪威。幼年献身基督。稍长，向往东方，尤慕中国，以传福音于我国民间为己任。一九一九年，二十七岁，奉派来华，选定河曲为其教区。自是，举凡救灾，医疗、教育均有贡献，造福地方，深植友谊。素奉圣经金句”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到来，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 “要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为座右铭。故以“永青”二字为华名。先生毕生勤劳忠诚，宣示和平爱人之道不倦，力斥侵略战争。一九三七年日寇侵我，先生助我军民，反抗侵略，惜事机不密，为敌军探知。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突以编队飞机俯冲轰炸教堂，先生殉焉。年四十七岁。先生酷爱中国，毕生为服务人民，抵抗日寇而死。缘立石于此瞭望河曲平原之地，以慰其灵，而垂永久。

一九九〇年八月十日